

新片
点击

《大闹天宫》： 孙悟空领衔的一场“热闹”打斗戏



□清 欢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也就同样会有一千个孙悟空。上年纪的观众们心目中最棒的孙悟空是老电影《三打白骨精》中涂着金色油脸，唱着绍兴高腔的“六龄童”——“江南猴王”章宗义；稍年轻些的观众觉得要论经典绝伦的仁义美猴王形象，那是非“六小龄童”莫属了；再年轻一点的观众也许更青睐周星驰无厘头“大话西游”系列中那个和紫霞仙子订下万年爱情契约的“至尊宝”……《西游记》是个名符其实的“聚宝盆”，能据此源源不断地衍生出各色面目的孙悟空。这一次，挥舞金箍棒，打上灵霄宝殿的孙大圣则是功夫了得的甄子丹。不过，马年新春隆重上映的国产3D大片《大闹天宫》虽是顶着“改编自《西游记》前八回”的名号面世，骨子里就是一部年度贺岁商业娱乐大片，为的是让万千观众在享受超凡魔幻视效后哈哈一乐。而观众们也只有在“有容乃大”的胸怀下去看这部完全颠覆原著情节的电影，才能沉浸于那份强烈冲击感官的光影享受之中。

“大闹天宫”是孙悟空“年少轻狂”时一段神勇无双的辉煌事，也是一段诱发“被压五行山”不堪后果的荒唐事。但没有大闹过天宫的孙悟空当不起“齐天大圣”的名号，没有在五行山下栉风沐雨苦历500年沧桑的孙悟空不可能成为后来西天路上降魔除怪的孙行者。只不过在这版《大闹天宫》中，孙悟空一场震天撼地的打斗不是出于无拘无束天性和骨子里强烈的反抗意识，而是为了友情——为青梅竹马的好友九尾狐之死，他在牛魔王的诓骗怂恿下迁怒于天庭，凭一根如意金箍棒搅翻天界，直到最后，胆汁质的尚武青年孙悟空才知自己被奸人利用，犯下大错。此时，这番天地为之黯然的“大闹”就不再是什么叛逆、神勇的举动，而只是一场热闹的打斗戏了。

说到“热闹”，片中完全改头换面的剧情首先将原著的忠实观众们给“雷”了个外焦里嫩：女娲娘娘为保三界和平，化晶石补天，其中一块晶石遗珠受日月之精华，变作石猴，这情节我们太过眼熟了，太具有剽窃曹雪芹创作“宝玉”来历的嫌疑了；天宫在危难之际，请菩提老祖前来助战，老祖却为牛魔王的妖气所败——想那菩提老祖是何等VIP级别的神仙，就这样在一牛精前颓然铩羽？太

不可信了；还有，孙悟空自愿被压五行山，铁扇公主是玉帝的亲妹子，二郎神甘愿给牛魔王当卧底等情节，真叫人晕眩不已。情节的瑕疵势必带来主题的变色。没有了原著中通过大闹天宫凸显的孙悟空的反抗精神，也没有了神猴大败十万天兵后“齐天大圣”之旗高高飘扬的英雄主义情怀。剩下的只是冷硬如铁的秩序和凄凉漠然的天数，只有“很傻很天真”，被人当枪使还一度不知的悲催石猴在一场华丽精彩却意义寥寥的战斗后，俯首服罪的仓皇和无奈。也许有人会说《西游记》位列于四大名著，情节人人耳熟能详，但其深邃主题本就一直存有多重性和模糊性，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都可借里面的情节来浇自己胸中块垒。《大闹天宫》既然是影视题材的二度创作，打上改编者自己的印记也在所难免。此话不假，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闹天宫》主题的确陷于平庸保守了，和原著中的思想主旨相较，高下立现。

《大闹天宫》在编剧上的贫乏无力已不言而喻，但该片最大的意义在于填补了我国真人版西游电影IMAX-3D特效制作的行业空白。好莱坞顶级制作团队倾力打造的特效令天宫云雾缥缈中的建筑群、仙界诸神腾云驾雾的灵动飞行及战后花果山那赤地千里，焦尸残骸的惨状都有了一种既奇幻又现实的呈现。尤其是周润发饰演的玉皇大帝幻化为一条活灵活现的中华神龙时，那份古典神奇的美轮美奂令人叹为观止。逼真细腻的龙鳞、龙甲、龙须简直是分毫毕现，栩栩如生。齐天大圣的“吹毫成兵”，擒仙索伸缩自若地束住美猴王、老君炼丹炉成就孙悟空一双火眼金睛，二郎神杨戬怒开额顶天眼……这些经典场面也都通过现代电影科技在银幕上有了三维立体的真实展示。要说视效上还有什么缺陷的话，也许就是西洋味过重了些，镜头在亦步亦趋的自我探索发展中还带有仿效好莱坞漫画英雄电影路数的痕迹。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以欣赏、品评无数演绎、衍生而来的孙悟空形象，但脑海中应该始终清晰该文学形象的传统本源是怎样的！所以最后有必要提一点：小观众们看完此片后，绝对需要适时读一读《西游记》原著，以对片中改编过度的情节进行“拨乱反正”。毕竟吴承恩笔下的西游故事才是华夏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永远宝孕光含的璀璨明珠。

视角
分享

前任不易做， 无可替代的前任打死不做

□齐伶圆

在春节这样一个举家欢聚、其乐融融的时候走进电影院观看《前任攻略》似乎有点不吻合这个大环境的气氛，但是由于实在无法对老少咸宜的煽情片产生兴趣，就看了由韩庚、王丽坤领衔的这部电影，并且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毫不矫情地笑出了肌腹，甚至差点哭出了眼袋。

作为女生，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被罗茜在订婚仪式上的那一番话戳中泪点。作为十四年扮演好哥们的自尊独立的当代女强人，她成功说出了一个女人最诚恳的内心独白：“我要的就是一个答案，你为什么不肯给我。”或许，大多数女性同胞看完后都要举起正义的大旗，义正言辞地声讨孟云。而我以为不然。就像孟云说的：即使再深的感情，也挡不住缘分的交错。两个人没有在对的时间走到一起，过去之后，对彼此最好的尊重就是退回到朋友这条线。无所谓可惜不可惜，过去的事情，再去咀嚼回味，也便是将自己囚在回忆的美好牢笼之中，再美，也只是羁绊。因为彼此都明白，不可能再走到一起，又何妨守着这一份不会被破坏的美好义无反顾地装傻到底。不过，女性永远是把持不住的一方，不然也不会有孟云那半被逼半无奈的一句“爱过”了吧。

再来说说剧中主人公孟云，总是觉得韩庚演这样一个角色十分别扭。他不像郑恺，天生带有一种大男孩的顽皮和狡黠，怎么看都是一个老实孩子的真挚模样，一口纯正的北方腔更是让我屡屡出戏，然后明明没有使坏的心，却要生硬地去演一个前任数都数不完的男人，实在是够为难的。还好庚少够深情，双目凝神，对美姐夏露道歉，说出我们结婚吧的时候，相信所有的女生都会被这种温柔攻势打败，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小女人。

诚然，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就在于这形形色色的“前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有时候感情不仅仅是奢侈品，更是“速食”品，男女双方默守心照不宣的契约，各取所需，好聚好散，所以也不难理解影片刚开始时婚礼中出现的前男友和前女友，以及各种令人捧腹的调侃。剧中人尚丹、萌萌、玲玲和其他不具名的前女友映射着男性在感情中的需求，也标志着他们的成长。其实无需感慨于这些不同类型的“女友们”，就像尚丹面对孟云对于她现任的惊讶时所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潜台词或许是，你可以有那么多经历，我就不能换换口味吗？

不过，导演在男女性别的区别对待处理得也比较妥帖。影片中出现的夏露前男友除了开头婚礼上的新郎，也只有我们爆笑的“思密达友人”朴恩浩先生，数量很少，质量却很高，以至于让孟云吃了不少干醋。大抵社会对于女性的前任相对态度保守，女性的经历还是少些为妙。这一点在余飞和孟云关于前任数量的对话也得到了印证，不管夏露说多少，孟云大概比她多俩。其实我觉得姚星彤的小女孩形象在片子里十分讨巧，既满足了男性同胞对于理想情人的想象，也符合清纯女神的大众审美。

最后，还是回到罗茜身上来。素颜女神王丽坤扮演的罗茜光芒太强，尔等只能膜拜。我想说，搁哪个男生能有罗茜这样的朋友，一辈子足矣。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在你开心时悄然离开，你难过时默默守候。表面上很强大，内心很脆弱。但是，女生们不要去追求这样高的战斗力了，因为你永远是那个“无可替代”的前任，而且没有扶正的那一天。奉劝一句，遇到赵明这样的男人，就赶紧嫁了吧。

时光易老，女同胞们可要想明白啊！

投稿邮箱：liz@cnbb.com.cn

余秋雨： 记忆文学

61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报，文章的标题很长，叫做《“文革”可以被遗忘，却不可以被掩盖》，作者正是曾远风，我吃惊地匆匆看了几眼。曾远风在那里愤怒地写道，有人要掩盖“文革”罪行，他绝不答应，一定要战斗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诉我，曾远风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变革”的批判者。很多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汉，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让人闻风丧胆。“你难道不想给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写封信？”我实在气不过，咻咻地向徐扶明教授。

“这没用。”他说：“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是挨打。”

他摇头苦笑了一下，又缩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远风说的要想掩盖罪行的逃犯。

这很像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现在平反了，却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闪闪地过日子，从来不控诉、不揭发、不声讨。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当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与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约半个月，一天下午，傍晚时

分，一个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进门就说：“院长，我叫曾远风，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你！”说着伸出手来要与我握。

我听说是曾远风，心里一咯噔，没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办公椅上，问：“什么事？”

曾远风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神秘地说：“上海在‘文革’初期演过一台戏叫《边疆新苗》，你知道吗？”

我既没有吱声，也没有点头，等他说下去。

“这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坏的戏，比样板戏还坏。样板戏剥夺了人民看别的戏的权利，《边疆新苗》剥夺了青年上学的权利！”听到这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徐扶明教授，我还有可能点一下头。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经对他有了鼓励，他的声调提高了：“这个月，正是当年上海学生到边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们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找那个姓沙的剧作者算账，要他归还青春。现在这个剧作者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听说，他已在托人找您，请您出场去说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紧急赶来，就是劝您千万不要为他出面！”

不管曾远风是不是夸大其词，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边疆的人员真的包围住了那个剧作者，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动，闹出人命都有可能。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一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商量这件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

海，不知道有《边疆新苗》这个戏。但他显然看不起那个剧作者，原因说不上。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这个剧作者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边疆新苗》的作者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边疆新苗》的作者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无言的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